■对 话

# 刘以鬯：让香港现代主义开花结果

## ——访香港文学研究学者赵稀方

□本报记者 王 杨

香港著名作家、编辑家刘以鬯于6月8日下午2点25分在香港逝世，享年99岁。

刘以鬯，原名刘同绎，1918年12月7日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宁波镇海，1948年底定居香港。刘以鬯自上世纪30年代起投身严肃文学创作，创作涵盖小说、散文、诗歌、评论等门类。代表作有小说《酒徒》《对倒》《寺内》《打错了》《岛与半岛》《他有一把锋利的小刀》《模型·邮票·陶瓷》，评论《端木蕻良论》《看树看林》等。他在创作中完好继承了五四新文学传统，率先引介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为香港文坛哺育了一大批作家，被称为“香港现代主义文学之父”。刘以鬯先生逝世后，记者就刘以鬯的文学创作特色及成就等话题，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二级研究员、香港文学研究专家赵稀方。

**记 者：**刘以鬯先生在百岁时离开了我们。刘先生的一生可以说是参与了中国文学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在您看来，刘以鬯先生文学生涯中最重要的贡献有哪些？

**赵稀方：**刘以鬯的重要贡献，简要来说，可以分几个方面：

一是现代主义倡导和实践。香港最早的现代主义思潮，开始于1956年马朗创办的《文艺新潮》，刘以鬯在其后期有作品发表。1960年，刘以鬯主编《香港时报》副刊“浅水湾”，重新聚集现代主义人马，并将香港现代主义推向高峰。他本人也致力于现代主义实践，于1963年创作出《酒徒》这一华语文学经典，使得香港现代主义开花结果。

二是以文学为本体，扶植年轻一代。五六十年代以来，香港文坛左右鲜明对立，刘以鬯在政治之外倡导现代主义。70年代前后，随着战后出生的新一代港人长大成人，香港文坛发生了历史轮替，不过刘以鬯却继续为年轻人所追捧。新一代香港本土作家多数倾向现代主义，是在刘以鬯等人的引导下成长起来的。

三是主编报刊，经营香港文学。自1941年大学毕业在《国民公报》和《扫荡报》做编辑，一直到2000年前后卸任《香港文学》主编，刘以鬯担任报刊编辑约60年时间。其中较为有名的是1960年《香港时报·浅水湾》和1985年的《香港文学》，前者推动了五六十年代香港现代主义运动，后者整合了香港文学的不同流派。

**记 者：**上世纪40年代，刘先生在上海就开始创作、编辑报纸副刊，还创办了“怀正文化社”，出版现代文学著作，与施蛰存、徐訏、戴望舒、姚雪垠等有诸多交往，您认为这对刘先生之后的文学创作有怎样的影响？

**赵稀方：**说刘以鬯是香港作家，其实只说对了一半，他资格很老，早期其实是现代文学作家。很少有人知道，中学时代刘以鬯就在上海参加了无名文艺社和狂流文艺会，并在《人生画报》1936年5月2卷6期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流亡的安娜·芙洛斯基》。中学毕业后，七七事变爆发，刘以鬯入圣约翰大学，又在《文汇报》副刊“文笔”发表了多篇小说。大学毕业后，他就开始在多家报刊任编辑工作，并发表作品。他还于1945年创办了怀正出版社，出版戴望舒译波德莱尔《恶之花掇英》、施蛰存《待旦录》、李健吾《好事近》等著作。后来他与姚雪垠计划创办《小说杂志》，因战争环境而中止，他带着一部分稿件如孙伏园的《鲁迅先生的小说》、戴望舒译《英国小说中的旅行》等来到香港。1951年，他在编辑香港《星岛周报》时，把这些文章发表了出来。

刘以鬯是从内地走出来的。他的纯文学和现代主义的文学趣味，都来自于中国现代作家。刘以鬯与后来香港作家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有深厚的中国现代文学情节，他很喜欢评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作家，自己的创作也是对于20世纪上半叶现代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记 者：**刘先生的《酒徒》《对倒》等作品写了知识分子的苦闷和生存，特别是香港这个国际性城市中人的现代性经验，这是否可以看作香港文学的一种独特性表达，其独特性在哪里？

**赵稀方：**刘以鬯的现代主义是很独特的，这来自于香港文化格局的独特性。由于殖民性、商业性等各种因素，香港既不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同时又没有建立起现代西方都市特有的那种人文传统，由此成为一个失去了文化根基的、纯粹实利化的城市。在香港，一切以金钱为中心，因此所谓文化只能是金钱支配下的畸型儿。这里的报刊完全按照“生意眼”选择作品，对于他们来说，“小说与电影并无区别，动作多，就是好小说，至于气氛、结构、悬疑、人物刻画等等都不重要”。真正的文学与艺术，成为了“票房毒药”，因此在香港是最不值钱的东西。在此种情形下，最畅销的文化作品是武打、黄色小说与动作片、粤语片。《酒徒》中的“酒徒”是一个职业作家，他14岁就开始从事严肃文学创作，有着较高的中外文学素养，他编过纯文艺副刊，办过颇具规模的出版社，出版五四以来的优秀文学作品。来到香港后，为生活所逼，他不得不放弃了二三十年的努力，开始为报刊写武打色情小说。他无法不受自己良知的指责，但不如此又无以为生，只好沉溺于酒中，用酒精来麻醉自己。

如果说西方现代主义多反映理性社会中人的精神分裂，香港的现代主义则较少人性的形而上体验，这里最为急迫的现实是商业性对于文化的侵蚀，是金钱对于人性的扭曲。《酒徒》(1962)全面反映了60年代香港的文化沉沦状况，揭示了商业化的香港都市对于人的心灵的压抑与扭曲，并发展出了一套现代主义的叙事模式。

**记 者：**《酒徒》究竟有何艺术特色？

**赵稀方：**《酒徒》被称为中国当代第一部意识流小说，刘以鬯并没有首肯这一说法，他只是说《酒徒》中运用了意识流手法。的确，刘以鬯对于西方意识流手法作了中国式的改造。意识流小说虽能深刻展示人的内心的无意识心理，但那种错乱无序的形而上意识并不符合要求情节的中国读者的阅读期待。刘以鬯最喜欢的作家是乔伊斯，但他最喜欢的作品却不是《尤利西斯》，而是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其原因就在于《喧哗与骚动》相对来说情节性强一些。《酒徒》的构思很巧妙，其主人公是一个常常酩酊大醉的酒徒，书中贯穿着“醉”与“醒”两重结构。“醒”时主人公是理性的，书中的情节由此而得到交代；“醉”时主人公是失常的，他内心的意识流动合情合理。如此，读者既明白了情节，又感受到了人物内心流泻的深度。

刘以鬯一直致力于“以诗的语言去写小说”，其跳跃的、意象性的诗歌语言产生了独特的效果。《酒徒》的诗化语言主要表现为：一、语句的分行、排比，段落的复沓；二、指陈性的叙述变为意象性的暗示。普通小说的散文体线性语言已被分行的、长短不一的、意象性的语句所代替，这给读者以突兀、跳跃，又含蓄、朦胧的感觉，正切合了心理流动的特征。刘以鬯《酒徒》的诗化语言或许受到了西方意识流小说的启发，但他已将其化为己用了，《酒徒》中的意象与韵律无不显出作者不同于西方的东方诗国气韵。

**记 者：**刘先生的现代主义写作方式或者说流派后来在香港的发展情况怎样？是延续了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

**赵稀方：**就刘以鬯本人来说，他在《酒徒》中坚持不懈地进行实验小说写作。他对传统小说结构的变革主要有两种类型：意识流与反小说。《酒徒》之后，刘以鬯主要将意识流运用于“故事新编”上。鲁迅以来，故事新编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历有传统，但刘以鬯的《寺内》等小说的隐性心理流动却另出机杼。“反小说”指对于传统小说结构的拆毁，《对倒》吸收福克纳《野棕榈》中的音乐“对位法”，分别用不同章节写两个人的故事，效果十分独特，无怪乎后来引起王家卫的兴趣。

就传承来说，香港五六十年代现代主义后来主要为新一代本土作家所继承。从70年代中期开始，新一代港人浮出历史地表，出现了《四季》《大拇指》《罗盘》等报刊，至《素叶文学》而达到高峰。也斯、西西等新一代港人，自觉继承发展了刘以鬯第一代现代主义的传统，吸收“新小说”“魔幻现实主义”等最新西方现代后现代文学思潮，将香港现代主义发展到了新的高度。

刘以鬯(右)与赵稀方合影

**记 者：**刘以鬯后期以主编《香港文学》闻名，这个刊物在文学史上有何贡献？

**赵稀方：**刘以鬯在香港主编刊物最成功的一次，是1985年主编的《香港文学》。80年代香港文坛面临着危机，特别到1984年，随着《诗风》《当代文艺》和《素叶文学》的停刊，香港文坛几乎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在这样一种危急情形下，《香港文学》挺身而出，重振香港文坛。作为主编的刘以鬯，因为自己的特殊地位，重新集聚了香港文坛各路兵马。无论左与右，无论本土与南来，无论老年与青年，多数都能在《香港文学》上发表作品，由此形成了香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学汇流。《香港文学》不但接续了香港文学的命脉，也创造了80年代以后香港文学的新的生命。

在《香港文学》的办刊过程中，一方面，刘以鬯作为南来文人，很重视衔接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仅1985年第一年，《香港文学》就刊载了“戴望舒逝世三十五周年纪念特辑”、“郁达夫殉难四十周年纪念特辑”等中国现代文学纪念专辑；另一方面，刘以鬯作为香港作家，又非常重视香港文学学科建设，发表了大量的香港文学报刊史料及评论，有意识地建构香港文学史。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香港文学》一直以大量的篇幅关注中国内地之外的华文文学，刊登了台湾、澳门及其东南亚、北美、欧洲等地区的华文文学，在世界华文文学的体系构造中，确定香港文学的主体定位。《香港文学》由此成为世界华文文学的重要阵地，这是香港作为一个独特文化空间的价值所在，也是它对于中国文学的最大贡献。

**记 者：**您与刘先生有过哪些交往？刘先生的为文为人有哪些特质给您印象最深？

**赵稀方：**我发表的第一篇香港文学研究的长文，是1996年10月发表于《香港笔荟》杂志上的《刘以鬯与现代主义》一文。刘以鬯的创作，在汉语文学中别开生面，吸引了我，也是我走上香港文学研究的动因之一。

后来一直与刘以鬯先生并无深交，只是在学术会议等场合见面，有学术上的交流。作为学者的我，感觉比较深的是，刘以鬯先生不但是作家，同时还是一个学者，这与中国当代作家是不太一样的。

刘以鬯对于现代小说有很独特的看法。他认为“现实主义应该死去了，现代小说家必须探求人类的内在真实”。在他看来，香港的“文艺小说”尚没有达到五四时代的水准，而中国现代小说与同时代的世界西方一流小说相比，仍然是落后的。《酒徒》第5节中，荷西门在谈到中国五四以来文学成就的时候提到茅盾的《子夜》和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我”却提出“以我个人的趣味来说，我倒是比较喜欢李劼人的《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与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至于短篇小说，“我”认为茅盾的短篇小说只是“中篇或长篇的大纲”，巴金的短篇只有《将军》值得一提，老舍的情形也差不多，“照我看来，在短篇小说这一领域内，最有成就、最具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首推沈从文”“谈到Style，不能不想起张爱玲、端木蕻良与芦焚(即师陀)。张爱玲出现在中国文坛，犹如黑暗中出现的光”。我们知道，内地对于沈从文、张爱玲等中国现代作家的重新评价，一直到新时期才开始，刘以鬯早已经在写于1962年的《酒徒》中就对此有大量阐述，应该是很有远见的。

至于为人，觉得他比较低调。不过，也听过香港文坛内部的一些人事关系，了解不多，并且这些都已经过去了。

# 他的文学成就还未被充分认识

□陈彦瑾

刘以鬯先生走了。他把属于自己的时代，属于自己的诗意，属于自己的百年记忆，留在了作品里。总体感觉，刘以鬯的文学成就还未被中国文坛充分认识，这位偏居一隅的“香港文学一代宗师”，在中国文坛还显得颇为寂寞。

## 生命最后岁月里审定的一套书

2015年，我与香港作家梅子联系，请他编辑《刘以鬯文集》，同时精选刘以鬯先生最具代表性的三部经典作品《酒徒》《对倒》《寺内》，结集为“刘以鬯经典”系列出版。这三部作品创作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迄今已有多个版本，刘老也对作品分别做过局部修改，使得不同版本略有差异。梅子精心择选了三部作品的最佳修订版本，其中，《酒徒》依据的是2003年香港获益出版事业有限公司推出的修订版；《对倒》依据的是2000年香港获益出版事业有限公司付梓的长、短篇合一版；《寺内》的篇目、分辑、排序依据的是1977年台湾幼狮文化公司期刊部的初版本，收录的14篇小说则尽可能优选刘老后来的修订本。

此外，梅子还选编了各版本序文、前言及相关评论文章作为附录，并补充了大量注释，使读者更容易理解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香港作品。编辑过程中，我和另一位编辑周方舟与梅子一起补注，花费了大量时间，每一条注释梅子都要请刘老确认，而刘老年事已高，则须刘太协助。后来，刘老已不能自己作答，便由刘太确认，有些则请教相关专家。

这三部作品，正如刘老自己所说，“我无意写历史小说，却有意给香港历史加一个注释。”创作时，刘老以简洁的文字、灵动的构思书写他所经历的时代和历史，其中一些带有历史印记的词汇，只有在补充注释后，今天的读者才能读懂其中的历史内涵。可以说，补充注释的过程，也是还原历史的过程。这套书也成为刘老在生命最后岁月里审定的一套作品。

## 纯粹的文心，不羁的灵魂

香港学者孙立川说：“20多年前，因文学之缘而认识了刘以鬯先生，总觉得他永远都保持着上海文化人的习惯，西装革履，梳着整齐的发型，钟意饮咖啡、吃西点、品尝美食，谈吐文雅，对西方文学流派及其手法十分熟悉，对内地、香港的文坛更是如数家珍。读他的小说，似乎可以看出他浓浓的上海情意结。”

生于富裕家庭的刘以鬯1941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主修哲学，其后辗转于重庆、上海、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曾创办怀正文化社，出版施蛰存、戴望舒、姚雪垠、徐訏等作家的作品，并主编《快活林》《快趣》《星岛晚报·大会堂》《香港文学》等报刊。1948年底定居香港后，靠一支笔在香港生存下来。他的首部小说《失去的爱情》(中篇)于1948年问世于上海，迄今著有小说集、散杂文集、文学评论集等40余种文学著作，尤以《酒徒》《对倒》《寺内》等小说开创了香港现代主义文学，被誉为“香港文学一代宗师”。

2016年，我因为其他事宜路过香港时，曾拜访过刘老夫妇，有幸与刘老有一面之缘。当时98岁的刘老面貌清癯，神情俊朗，像北京的秋天一样爽利，一如他的文字，清朗、干净、简洁、灵动，一尘不染，没有一丝多余。他有着纯粹的文心，有着孩童般的奇思异想，有着少年般的诗意，有着古典文人的风骨、情怀，又有着现代不羁的灵魂，所有这些化成文字，便是他与众不同的纯文学观念，使他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写出了一批具有世界意义的现代主义作品。

编辑文集时，我常常为作品的奇妙构思、令人惊艳的实验性笔法而拍案叫绝，像“借来的爱情，只是无色无臭无形的一团，游弋在黑暗中，与黑暗无异。寂寞被囚在深夜的斗室中，而欲望则如舞蹈者。突然想起幕前的笑容与幕后的泪水。”“那些消逝了的岁月，仿佛隔着一块积着灰尘的玻璃，看得到，抓不着。看到的种种，也是模模糊糊的。淳于白一直在怀念过去的一切。如果他能冲破那块积着灰尘的玻璃，他会走回早已消逝的岁月”……怪不得很多年轻人喜欢刘以鬯的作品，因为那里跳动的是一颗纯粹的文心，还有一个不羁的灵魂。

《酒徒》是刘以鬯先生的代表作之一，被誉为“诗化意识流小说开山之作”和“现代文人小说高峰”。2004年引发香港导演王家卫拍摄电影《2046》，2011年由香港导演黄国兆拍摄成电影。它写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商品经济盛行，文艺也高度商业化的背景下，一位艺术良心未泯的作家，挣扎于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不愿典卖自我价值而不能，只好一面煮字疗饥，靠写文字垃圾求取生存，一面自责忏悔，借酒麻醉，沉沦为不能自拔的酒徒。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阅读《酒徒》定然会有似曾相识之感，书中酒徒说出的恐怕也是今天在商业规则面前苦闷挣扎的人们的心声。《酒徒》也是一部关于小说的小说，一部前卫艺术的杂烩。它的语言、技巧、表现手法和文学观念都具有穿越时光的创新性和艺术性。

“对倒”指一正一负双连邮票，借用此形式，刘以鬯于1972年创作了长篇小说《对倒》，后又将其浓缩为短篇。《对倒》最令人惊叹的是与众不同的构思和对电影手法的借鉴。它写一个从上海移居香港、在回忆中怀旧的中年男子和一个香港土生土长、在幻想中憧憬的青春少女，他们互不相识，各自游荡在70年代的香港街头，迎面而行，又背向远去，仅有的一次邂逅，也是擦肩而过……2000年，《对倒》引发香港导演王家卫拍摄了电影《花样年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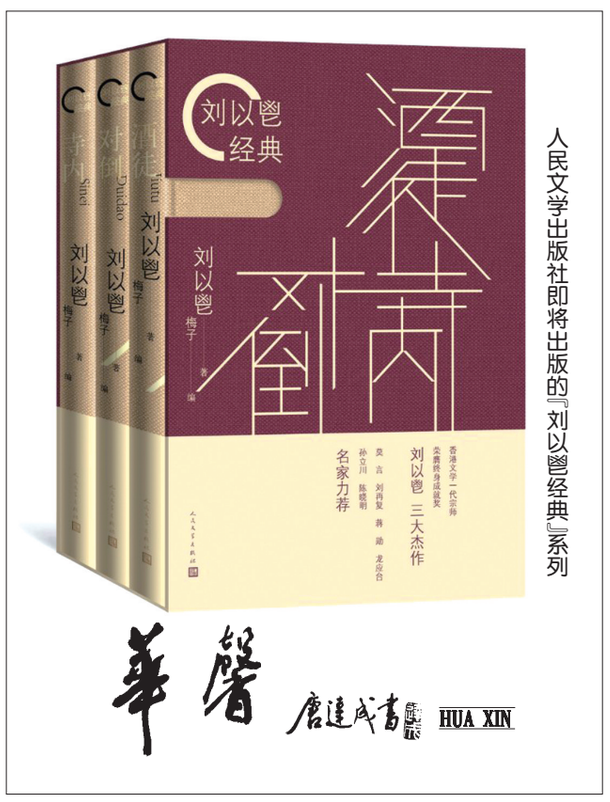
《寺内》收入了14篇新颖多彩的中短篇小说，熔想象与诗意、古典与现代于一炉，或为故事新编，如《寺内》《除夕》；或表现香港现代都市之人与事，如《对倒》《链》《吵架》《赫尔滋夫妇》《龙须糖与热蔗》《圣水》等；或探求生命哲理，如《蟑螂》。这部结集于1977年的小说集，以“求新求异”的文体实验，彰显现代小说的新锐与性灵。

从现在的眼光去看这三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其语言、艺术、观念等都依然是前卫的、新锐的，同时，又是古典的、中国的、历史的，是从中国土壤上生长出来的不老的现代艺术之花。

## 诗化意识流，小说新道路

意识流是刘以鬯作品的标签化字眼。在《酒徒》初版序中，刘以鬯先生介绍说，意识流这个名称首先出现于心理学家詹姆士的文章，第一个将其运用于小说的是杜雅丹，后来，伍尔夫、乔伊斯、普鲁斯特等作家都在小说中运用此手法。刘以鬯认为，意识流是小说家探求内在之真实的一种技巧，而非流派。“现代社会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只有运用横断面的方法去探求个人心灵的飘忽、心理的幻变并捕捉思想的意象，才能真切地、完全地、确实地表现这个社会环境以及时代精神”，这是写实主义所不能完全做到的。正是出于这样的文学观念，刘以鬯写出了《酒徒》，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意识流小说”。但也有人说，30年代穆时英等人的新感觉派小说也运用了意识流，所以，“刘以鬯经典”系列对《酒徒》的介绍是“诗化意识流小说的开山之作”，强调刘以鬯小说开创的是“诗化意识流”。这是因为，刘以鬯小说的意识流不仅仅是技巧，更是观念，不仅仅要写出“内在真实”，还要写出“与众不同的小说”。而刘以鬯认为，由于电影和电视高度发达，小说必须开辟新的道路，其中，诗化小说——让小说与诗联盟——是《酒徒》探讨的小说新道路。他说，“写《酒徒》时，我故意使诗与小说结合在一起”，并引用柯恩的话：“诗是使文学继续生存的希望”。所以，也有学者称刘以鬯的意识流小说为诗化意识流、东方意识流。

《中国现代小说史》作者杨义曾说：“如果这样谈论刘以鬯，说他承受着香港商品经济浪潮铺天盖地的冲击，以始终不懈的艺术真诚，在南天一隅出奇制胜，率先使华文小说与世界新锐的现代主义文学接轨。那么他在香港甚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就凸现出来了。”并说：“香港文坛应该为出了刘以鬯而骄傲，他创造了独具魅力的东方诗化意识流艺术，属于东方，又属于现代，代表着香港探索文学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是对刘以鬯文学地位的中肯评价。




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刘以鬯经典』系列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邮政编码：100125 总编室电话/传真：(010)65003319 新闻部电话/传真：(010)65002492 宣传发行部电话：(010)65935482 广告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20170145号 零售每份0.70元 印刷：中国青年报社印刷厂